

中国思想小史

常乃惠 / 撰

葛兆光 / 导读

蓬莱阁典藏系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思想小史

常乃惠 / 撰

葛兆光 / 导读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上海古籍出版社

蓬莱阁典藏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思想小史 / 常乃惠撰; 葛兆光导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5

(蓬莱阁典藏系列)

ISBN 978-7-5325-8921-0

I. ①中… II. ①常… ②葛… III. ①思想史—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44421 号

蓬莱阁典藏系列

中国思想小史

常乃惠 撰 葛兆光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市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地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m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7.875

插 页 5

字 数 112,000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921-0/B·1064

定 价 34.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晚清民国,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旧传统与新思想无时不在激荡中融汇,学术也因而别开生面。士人的眼界既开,学殖又厚,遂有一批大师级学者与经典性著作涌现。这批大师级学者在大变局中深刻反思,跳出旧传统的窠臼,拥抱新思想的精粹,故其成就者大。本社以此时期的大师级学者经典性著作具有开创性,遂延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撰写导读,希冀借助今之专家,诠释昔之大师,以引导读者理解其学术源流、文化背景等。是以本社编有“蓬莱阁丛书”,其意以为汉人将度藏要籍的馆阁比作道家蓬莱山,后世遂称藏书阁为“蓬莱阁”,因借

取而为丛书名。“蓬莱阁丛书”推出后风行海内，为无数学子涉猎学术提供了阶梯。今推出“蓬莱阁典藏系列”，萃取“蓬莱阁丛书”之精华，希望大师的经典之作与专家的精赅之论珠联璧合，继续帮助读者理解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与大师的治学风范。

导读 常乃惠和《中国思想小史》

葛兆光

这里要讨论的是常乃惠和他的《中国思想小史》。

晚年的洪业(煨莲)在一次回忆时,曾经说到他对常乃惠的印象和抱憾,大约在 1923 年前后,燕京大学准备请王桐龄来教中国史,但王桐龄却推荐了常乃惠。当时,洪业有点儿看不起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常乃惠,“常乃惠来了,但我对他印象不好,他像个干瘪了的书生,头发乱七八糟,脸也不刮,长年穿一件破烂的蓝布大褂。因为他刚毕业,便聘为讲师,在宿舍分配了房间给他住,他在里面整理讲义,很少出来,我也很少理会他。我太太和我常请其他教员来吃饭,可我不记得有没有请过他。教了一年,他大概也觉得没受到赏识,就辞职了。我

也没费力气留他，心里想走了也就算了。结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这个人后来成为青年党的台柱，是宪法运动中很重要的人物，又建立了新的历史学派，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而我却错过了他”^①。

这个使洪业直到晚年还相当遗憾的常乃惠(1898 - 1947)，现在，可能学术史和思想史都已经不太关注他了，但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他倒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物，说他值得重视，一方面是他对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确实有他的特别之处，另一方面是他本人在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演出也相当引人注目，两方面都可以列入 20 世纪中国的学术史与思想史。

常乃惠确实是一个很奇特的人^②，说他奇特，并不是讲洪业先生所看到的他的邈邈和不拘小节，而是这样一些地方。首先，他成名很早，在“五四”以前的 1916 年到 1917 年间，不满二十岁的常乃惠，就和当时大名鼎鼎的教授陈独秀发生过

一场争论,令人很惊异的是,年轻的常乃惠对于传统的温和思想,与中年的陈独秀对于传统的激烈态度,恰恰相映成趣,倒好像前者是中年,而后者是青年一样^③。其次,还令人称奇的是,他虽然仅仅活了五十岁,可在短短的生涯中,一个人竟然写了《社会学要旨》(上海,中华书局,1925)、《中国民族小史》(上海,爱文书局)、《中国史鸟瞰》(北京文化书社代售本,1925)、《中国文化小史》(中华书局,1928)、《中国思想小史》(上海,中华书局,1928)、《中国财政制度史》(世界书局,1930)、《法兰西大革命史》(中华书局,1930)、《生物史观与社会》(上海,大陆书局,1933)、《西洋文化简史》(中华书局,1934)、《文艺复兴小史》(中华书局,1934)、《德国发达简史》(中华书局,1934)、《历史哲学论丛》(重庆商务,1943;商务,1947)、《蛮人之出现》(上海,中华书局,1937)等数十种著作,古今中外、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涉及面之广令人吃惊。再次,让人更加感觉他特别的是,他似乎和当时思想和学术界的很多重要人物立场都不一样,他对于古代的中国历史,似乎总有一些特别的看法,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政治,也有着他自己的

立场与观念,这使得他的著作虽然简略,却与众不同,当然,也因此并不被后来过多注目于激进和保守两端的学术史和思想史所重视。最后,他对于学术似乎是半心半意,虽然他相当有才气,也相当有想法,但是,他似乎更热心实际政治,作为青年党创党的重要人物,他主办过《醒狮周报》和《国论》,参加过国民参政会,访问过延安^④,抗战以后又担任过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府委员,他的很多历史与文化研究,显然有他的现实关怀孳杂在里面,这使他的研究学术性多少打了一些折扣,他的政治立场也使他本人的学术史意义,多少受到一些不公平的牵累^⑤。

常乃惠和很多注重思想与文化的新派学者不同,倒和陈铨等所谓“战国策”派声气相通,对于中国社会、历史与政治,他最重视的一个关键,是中国是否可以成为世界万国中可以站在前列的“国家”。他并不否认思想与文化的重要性,1935年,常乃惠写《二十年来中国思想运动的总检讨与我们最后的觉悟》,同意近代是中国两千年来大变局的看法,说中国人从两千年的大梦中醒来,“世界大变了,天也异气了,地也异色

了……”，所以，他焦虑的也是“中国人将何来何往何去何从”，思想与文化固然要更新，但是，他认为这种思想与文化的更新，需要一个坚实而有序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他以他所谓的“生物史观”来看历史，认为“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则，就是从无组织进化到有组织，从简单组织进化到复杂组织”，而中国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仍然滞留在民族社会阶段，丝毫不曾进步，而来征服我们的，却都是些已经完成近代国家机构的国族社会的先进者”^⑥，那些他所谓的“国族社会”，即“在心理方面成立了国族意识，在生理方面也成立了近代国家的机构”。所以，他认为，过去的维新党人，从坚甲利兵派到政治革新派，从政治革新派到“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派，始终没有认识到“国家”这一点的重要性^⑦。

也许，这是1931年“九·一八”事件以后中国思想界的新认识，不仅仅是常氏，很多人都有这种观念，包括他所引用的马君武（《立国精神》）和傅斯年（《中学军训感言》），这种观念来自对于现实的感受，而这一感受则贯穿了他的整个论述。他以这一思想作为尺度，反观现代中国思想界，所以，对于“五

四”和《新青年》就有一些批评，他认为《新青年》派“在消极上对于家族主义制度和理想的攻击，使这障碍国家发展的最后残垒倒了下去，这是《新青年》对于中国唯一的功绩。然而，不幸他们在积极方面，对于未来中国的建造并没有提供出有力的意见”。和林毓生所说的，中国人总是习惯从思想与文化方面解决问题不一样，他特别强调的是，要从制度和国家的角度来建设新中国，因此他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派，尽管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作为思想的中心，但是没有建立更坚实的政治和制度基础，他认为，所谓民主与科学必须在“一个完备的近代国家组织和意识之下”才能够发生效用。可是，“五四”以后，家族主义破坏了，传统的文化道德破坏了，原有的国家基础破坏了，新的东西却没有建立，他追问：“新的可以代替的东西在哪里呢？是胡适的个人主义吗？是陈独秀的阶级主义吗？是周作人、鲁迅的虚无主义吗？”他觉得，正是因为“中国的思想界在‘五四’以后变成了一片空地”，才产生了个人主义猖獗的时代，才出现了“怀疑、烦闷、混乱”^⑧。

乍一看上去，似乎这是逆新文化的历史潮流而动，其实，

从接受西方现代文明,以改变旧中国和旧文化这一思想系谱来看,在这一系谱中,他恰恰是极其激进的。1922年他写《反动中的思想界》,激烈批评知识阶级眷恋旧骸骨,接受西洋文明太笼统太调和,甚至指责新思潮并没有改变“根本的态度”,说“根本的态度不变,自然建筑在表面的一切新思想都是靠不住的,目前虽然是轰轰烈烈的思潮,反动力一来,便只有冰消瓦解了”。那么,为什么根本的态度不能变化呢?他说,是因为“欧洲的思想变动可惜走得太快了,于中国实在不见得有什么好处。中国人本是从十八世纪以前才觉醒的人,一睁眼便看到了十九世纪的光华灿烂的世界,还未到下床走路,人家已经揭过一篇又走到二十世纪上来了。恰好新揭开的这一篇又颇有点投合中国人的习惯心理……结果当然变成了新招牌下的旧货摊了”^⑨。1928年他又写《前期思想运动与后期思想运动》,指出当时代需要我们向前战斗的时候,可是“有的人已经回到国故的坟墓里去了,有的人已经回到爱人的怀抱里去了,有的人已经回到大学教授的书斋里去了”,他说,“五四”的时代似乎结束了,“《新青年》时代以后,中国的思想界忽而杜

威的实验哲学,忽而罗素的新唯实主义,忽而《语丝》派的怀疑思想,忽而共产派的唯物史观,仅仅十年之间,变换了若干种不同的花样”,他指出前期的斗士只是有消极、批评、破坏,但是缺乏建设的新生力,而现在应当从前期盲目的、被动的、不自觉的文化运动,变成意识的、自觉的、有计划、有目的、有理想的后期文化运动。^⑩但是,究竟什么是他的理想和目标,大概是他所说的新的中国文明、健全的中国国民意识,而基础则是新的国家。《蛮人之出现》中所说的“蛮人”,和“少年中国”的“少年”,“新青年”的“青年”一样,不是垂死的衰朽的,而是实际的、为他的、乐观和有希望心理的、真实的人,这就是他所期待的新的国民,让这种“蛮人”精神,使衰老的民族返老还童^⑪。

外敌压境,风雨飘摇的时代,使人们普遍有一种焦虑,这种焦虑使得人们相信,需要有一个可以得到安全感的基础和依托,这基础和依托,在常氏看来,就是一个强大的国家。1935年7月他在《国论》的《发刊辞》中说:“我们应该明白事实是不可以口舌争的,口号标语的运动是经不住事实的一试的。

没有内容的空话,说了等于不说,甚至比不说还坏。自己本身还没有自主能力的国民,不配喊打倒帝国主义,领土不能保全的国家,不配讲世界和平,要有抵抗的实力摆在面前,才配说抵抗,要有外交的后盾搁在后面,才配说外交,否则,便一切都是空话。”^⑫如果我们仔细体会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中国的处境,就会觉得他把国家组织和制度的建设放在文化与思想之上的观念,好像也有一些道理^⑬。

二

让我们先把常乃惠本人对当时社会与文化的观念放在一旁,先看看他在《中国思想小史》里面是怎么描述中国思想史的。

那个时候,常乃惠对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已经有他自己的思考。如果我们熟悉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界,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常常缺乏明确的边界,1929 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梁启超那部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⑭,其实是学术史也是思想史。然而,1930 年,在刚刚

出版的《中国思想小史·导言》中，常乃惠就首先区分了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同”与“不同”，指出学术史（包括哲学史）的内容偏重“学说的内容，师徒传授的门户派别，以个人为中心的学者传记等等”，但是，思想史“注重的乃是一时代思想递嬗的源流大概，及于当时及后世的波动影响”，所以“讲学术史尽可以个人为中心，多少忽略时代与地域背景，讲思想史却完全不能不注意到时代、地域等等交互的影响”。在他看来，“思想”是“民族精神”结晶的表现，而民族精神“一半是民族血统，一半是地域环境与时代环境所造成”^⑮，思想史应当在历史与地理中寻找发生的背景与意义的解释。这种关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看法，似乎至今也还有它的价值^⑯。

在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里，他对于中国思想的历程提出了很多尽管不一定正确，但很有意思的想法。

第一，由于他认为思想史不应当像学术史或哲学史那样，以个人为中心，而应当关注思潮、历史背景、地域环境，所以，常书的体例相当特别，他共分二十一章，不以“人”或“书”为章节，而是以思潮和问题为章节，比如唐宋以后的思想史，他设

立了几个题目,在关于汉魏两晋南北朝到唐代的佛教两章之后,他列了第十一章《唐宋间理学未兴前之新形势》、第十二章《宋朝理学的起源及其成立之经过》、十三章《理学的大成和独占》、十四章《程朱学的衰落与王学的兴起》、十五章《理学的反动时期》、十六章《考据学全盛下的清代思想界》和十七章《思想的解放与今文家的活动》,而关于近代思想史,他则在《欧洲思想与昔日之中国》一章后,设立了十九章《政治思想与实际政治活动》、二十章《新文化运动的黎明时代》以及第二十一章《新文化运动的成绩》。这种写法,不仅避免了写成“师徒传授的门户派别,以个人为中心的学者传记”的“系谱”,而且把思想史的重心放在思想的延续上,并把这种延续性伸展到了当下,给传统与现代勾勒了一个“历史”过程。

第二,他的很多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解释背景,不仅来自中国的历史,而且也引入西洋文化和思想。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中国传统的思想和学术的重新解释,不得不放在西洋背景之中,这是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尽管中国思想本身的发生与成长,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自足文明之中,但正如宗

教学家缪勒(F. Max Müller)引用哥德名言所说,“只知其一,一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这个时代里,所有的解释都必须有“他者”的映衬,否则无以定位。所以,常氏动辄就引用西方来进行比较,例如关于古人相信民神不杂,相信巫觋的中介沟通,他就评论说,中国古代的这些观念“都是与具体的人物,且系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不似希腊、印度及波斯神话之多代表抽象的哲理”(第一章,12页)。又如在谈到《洪范》以天则人以及五行说的时候,他觉得,这很像《摩西十诫》(第三章),而讨论清代思想史的时候,他和当时很多人一样,把清代思想史与同时段的欧洲文艺复兴相比附。由于他自己写过很多关于西洋史的著作,所以《中国思想小史》的这种比较,常常有很别致和独到的地方。

第三,对于中国思想世界,他也有一些独出心裁的想法显示出他既不随大流,又能广泛吸收各家之说。比如他断定儒墨是中原“诸夏”的思想,而道家、阴阳家则归之于“东夷”,至于法家,则被他说成是来自“氐羌”,又受东夷影响的结果。这种说法的来源,显然一方面来自当年学术界从王国维到傅斯